



奎多·范·德·卫夫

GUIDO
VAN
DER
WERVE

不是**电影**，
也不是**艺术**，
而是**诗**。

这位创作了也许是“本世纪最有启示录意义画面”的艺术家第一次带着他的影像来到北京，我们也许仍没有理解他影像中的母题，但至少因为他了解到，原来，没有叙事的影像艺术并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闷，说到底，比起故事，情绪才是人类身上最本质的东西。

NOT VIDEO, NOT ART, BUT POEM

It is still not easy for us to understand the motif in Guido's video, but it makes us know that non-narrative video art is less stuffy than it seems.

[文 全侏西] [摄影 李明] [鸣谢 M WOODS美术馆]

2007年4月的一天，在银白色的雪地里，准确地说是北极点上，有一个黑点，那是一个人，他一动不动，偶尔活动活动僵硬的双腿，跟着太阳顺时针转动自己的身体，他脚下的地球正在做永远的逆时针旋转——这意味着地球正在围绕着他旋转。

隔着镜头能听到低沉的风啸，狂风中他旋转了24小时9分钟，正好一天。这没有黑夜的一天被他剪辑成了九分钟的影像，叫作《我没有跟随世界旋转的一天》（The day I didn't turn with the world）。8年之后这部荒诞却不乏诗意的影像作品在中央美术学院播放的时候，观众在结束时爆发了阵阵掌声。

这个人叫作奎多·范·德·卫夫（Guido van der Werve），维基百科对他的描述是“荷兰电影导演、视觉艺术家，以挑战生理极限的影片著名”。此时他站在中央美术学院的讲台上分享创作经历，因为他2012年创作的影像《第十四号，家》（Nummer veertien, home）刚被坐落于北京798的MWOODS美术馆永久收藏。

在没见到奎多本人之前，我尝试想象的他是忧郁的北欧男人，跟《第十四号，家》呈现的画面一样潮湿和阴冷，“54分钟的影像一直忧伤、偶尔古怪、不时疯狂，诉说着一个关于渴望、乡愁、屈服和死亡的故事。”曾获美国国家杂志奖的“毒舌”艺评人Jerry Saltz在专栏中如此评论这部影像。我甚至为此练习了自己的英式发音，好听上去更接近欧洲的忧郁，更接近他的情绪。但原来奎多有极好的美式发音，如果想从他的口音里得知他的出生地怕

是徒劳的——他正在着手的书是用英语而非他的母语写的。

他显然是个精力充沛的运动爱好者，也许会犯点儿类似误机的小迷糊——他刚因记错时间而误了来中国的飞机。开始采访之前他对在北京糟糕的空气中没办法进行户外运动抱怨了一下。我说：“我还以为你是一个忧郁的人。”（I thought you are someone blue.）“啊对，你看，我今天穿的外套就是蓝色的。”（oh yes I'm in the blue.）他甚至有些冷幽默。

之前跟摄影师说要拍一个“忧郁的艺术家”，摄影师拍了好一会儿，说这很难，他只能拍出一个貌似极客（Geek）的IT男，拍摄过程中奎多一直在做鬼脸。

“我喜欢电影，但我从不觉得自己是电影导演，从不。”奎多如是说，尽管他以数字命名的影像系列已经做到了第十四号——这期间他从荷兰到美国到芬兰到德国，作品从单一动作到有剧情，他本人也从一个店员变成个展的艺术家。“我只是觉得影像是最丰富的艺术媒介，仅此而已。”奎多说，与维基百科的描述形成另一个反差。或许Jeff Saltz极端的评价有那么一些道理：“这些作品既不是影像，也不是艺术，它们都是诗。”

2003，荷兰。

“有演员的电影太假了，用音乐代替演员吧”

2003年，奎多从阿姆斯特丹的格里特里特维尔德学院（Gerrit Rietveld Academy）毕业，

在荷兰当地一家纪念品商店做店员，对工作没兴趣的他喜欢去电影院看观众随电影情节或哭或笑。没事时他会拍一些小片子，用来“寻找心灵的平静”。其中一个以电影院为背景，门前的奎多被一辆车撞飞横躺在大街上，身边有一群正在跳舞的芭蕾舞者。影片没有演员、对白和情节，只有音乐和扑面而来的情绪。

那时他已经觉得需要“扮演”的电影都不真实，喜欢借助音乐表达情绪的片子，“人类是对情绪最敏感的生物，有时我们记忆模糊了，但仍会记住当时的情绪。音乐让个人的情绪具有普遍的意义。”之后，奎多开始让音乐替代演员，用情绪而不是情节推动整个影片的发展。

意识到这一点时，奎多已经7年没弹过钢琴了。戏剧性的一幕发生在朋友聚会上，他随便在钢琴旁凭儿时的记忆弹了几曲，一个背景音乐制作人找他聊了聊，从那以后奎多开始录制自己的音乐，这些音乐在他接下来的影像中大放异彩。

2007，北极。

“这可能是本世纪最有现代启示录意义的一幅画面”

“我尝试让叙事更简单，简单的东西才有普适性。”在运用音乐叙事不久之后，奎多发现运动也是不错的叙事方法——和音乐一样，简单重复的肢体动作带来直觉、情绪和极限体验的东西。

在搜索引擎里输入奎多的名字，结果中出现最多的是两幅画面，一幅是前面提到的他孤



奎多2007年的作品《我没有跟随世界旋转的一天》，在北极点旋转的24小时9分钟之内，一直是白昼，影子绕着他转了一圈，太阳在天空中绕一圈后回来原来的地方。



奎多被人称为“本世纪最有现代启示录意义的一幅画面”的作品来自他2007年的另一件作品《第八号，一切都会好的》。



奎多2005年的作品《第五号，我不想卷入其中，我想置身事外，快劝我停下来》(Nummer vier, I don't want to get involved in this. I don't want to be part of this. Talk me out of it)，在湖中弹钢琴的奎多此时手上停满了蚊子。

独地站在北极点旋转的画面，在这部影像中，奎多第一次尝试自己谱曲并收获好评；另一幅是奎多徒步走在北极冰原上，一艘巨大的破冰船在他身后不远处轰然迫近的画面——画面中，他的每一步都有被轰然吞噬的可能，画面来自他同年在北极做的另一个影片《第八号，一切都会好的》(Nummeracht, everything is going to be alright)。“这可能是本世纪最具有现代启示录意义的一幅画面，”有艺术评论如此写道。这个无意义的动作具有某种史诗般的美感，很容易让人想起同样来自荷兰的观念艺术家 Bas Jan Ader，这位总以“被矫情削弱的英雄式追求”为主题的艺术家在1975年试图用最小的帆船穿越大西洋【这是他行为艺术作品《寻找奇迹》In Search of Miraculous)的一部分】，最终Ader永远消失在海上。

2008，纽约。

“在拉赫的年代，欧洲人常常用洋甘菊治疗精神疾病”

2009年，《第八号，一切都会好的》被美国当代艺术博物馆(MOMA)永久收藏。

事实上，这种启示录的画面在奎多的影像中反复出现，在《第十四号，家》中，奎多或全身燃烧，或被吊车悬挂空中，或从空中突然坠入水中……像某种现代意义的殉道者，危险、狂欢、荒唐却又高尚。

在创造了两件里程碑式的作品之后，奎多去了纽约，准备在永不缺乏新鲜事物的纽约做一些新尝试：“我不想再让我的头脑控制我的影片，也不想再在影片中塑造什么主题。”

在得知俄国作曲家拉赫玛尼诺夫(Sergei V. Rachmaninoff)被葬在纽约瓦尔哈拉(Kensico)公墓之后，从小是古典乐迷的奎多觉得拉赫太孤独了，于是举办“冲向拉赫”的活动向他致意——每年从曼哈顿出发跑去他的墓地。跑向墓地的人每人手里都拿着俄罗斯的国花洋甘菊——“在拉赫的年代，欧洲人常常用洋甘菊治疗精神疾病。”奎多这么解释洋甘菊的意义——拉赫曾因挚友的去世出现一些精神问题。作为20世纪世界最重要的古典音乐作曲家，拉赫长期旅居国外，远离祖国，后期的作品常常带有忧郁的情绪，1943年因癌症扩散在美国去世。

无论从什么角度来看，“冲向拉赫”的活动都像是影像《第十四号，家》的一个伏笔——拉赫和肖邦，同样的才华横溢、埋葬他乡的忧郁作曲家；从曼哈顿岛瓦尔哈拉，从华沙到巴黎，同样与家和死亡有关的归途；洋甘菊和泥土，奎多手握的信物，同样也因这与死亡有关的浪漫想象成为温暖人心的东西，附带一点幽默。

两年后，因为觉得纽约不适合自己，奎多搬去了芬兰的乡村。

2010，柏林。

“我不再觉得疼痛”

在芬兰的奎多，除了跑步什么也没有做——他的一件影像作品，是围绕着自己的房子连续跑了12个小时100公里。两年之后，他搬去柏林，那年他35岁，第一次想对自己的前半生做些回顾。从这个角度来说，《第十四号，家》是奎多此前很长一段时间影像艺

术的集大成者：关于死亡的母题、用铁人三项穿越1700多公里的身体极限、连绵不断的向前延伸的欧洲公路与河流、肖邦和亚历山大大帝这两位客死异乡的浪漫英雄主义者、奎多自己谱写的如梦幻般的安魂曲、不断出现的有殉道者意味的画面、肖邦“我不再觉得疼痛”的遗言……38岁便客死巴黎的肖邦曾让自己的姐姐秘密将自己的心脏带回华沙，奎多带着埋葬肖邦心脏的教堂的土，一路奔跑、游泳、骑行1700多公里，将这抔土带到肖邦的墓前。在这个过程中，影片也穿插了亚历山大大帝的故事，这位传奇的将军带领征服了大约500万平方公里的领土，32岁时客死返乡途中，坟墓至今未被发现。

奎多在影片中延续了他古典、冷静却又充满情绪的审美，庄严的合唱团、缓慢流动的画面、打动人的古典乐、永远阴冷的天空……诗歌一样的田园画面在婉转起伏的安魂曲下一幅接一幅，日常生活中非常明显的空间感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充满不确定性的情绪，这种不确定的情绪来自奎多对死亡和家充满浪漫想象的解读。而死亡和回归的背后，又自有欧洲文明失落、优越感丧失的母题。但这个严肃的母题到这里似乎戛然而止了，奎多正在着手的下一部作品将会讨论人的潜意识，一个他认为有无限潜力的地方。

生活中的奎多多少了影像中的忧郁，享受在芬兰和德国悠闲的生活：“纽约？纽约竞争太激烈了，人人都在想你死我活的东西，不适合我。价值有高低，但至少你要快乐。”他抬起眼皮说，就好像刚刚影像中的一切，都与他无关。



对话奎多·范·德·卫夫

《第十四号, 家》 我的家乡, 有些丑, 还有些无聊。

“我的家乡? 嗯, 是一个又丑陋又无聊的地方。”这样的直接让人惊讶, 人们本以为他会说一个美好又忧伤的故事。“我没有能记住的家乡故事, 那是一个无聊的地方, 没有任何新鲜事发生。”他又把“无聊”二字强调了一遍: “我相信所有在欧洲乡下长大的孩子都讨厌他们的家乡, 因为实在太无聊了。”他第三次强调了“无聊”这两个字。

[采访、文/全侏西|录音整理/贾玮]

《芭莎艺术》：制作这段影像的想法是如何成熟的？

奎多：这是一个很长的过程。在纽约住了两年之后我搬到了柏林乡下，在那里每天跑步。之后我收到纽约 SP1 关于新作品的邀请，我说最近忙着跑步没有新作品，他们就建议做关于跑步的作品，我觉得可以做一件把我的艺术想法、跑步和喜爱的作曲家结合的作品。因为我觉得运动是人很本能的东西，想从运动中提炼出一些特别的东西。而且从纽约搬到柏林的时候我 35 岁，意识到自己已经在这世上活了很长时间，便第一次想回头看看这一生，所以“家”是一个比较合适的主题。我觉得应该试图去寻找文化角度上的濒死体验，所以就准备写类似安魂曲的东西，这也是后来影像中的主干。那时我刚开始厌倦跑步了，转而尝试铁人三项，索性写安魂曲的时候也写了对应的三个乐章。

《芭莎艺术》：你是先写音乐还是先写剧本？

奎多：这个过程是相伴相成的。当你创作音乐时，更多的是一种抽象意识，创作音乐和情感有更多的联系，音乐能把握住电影抽象的情感。写剧本时我基本摒弃了自传性质的东西，我觉得音乐已经帮助电影表达了我想表达的东西。后来拍影像的时候很顺利，半年就拍完了。

《芭莎艺术》：你说到了真实，但在真正拍摄的时候可能只是记录几个镜头，不会还原整个过程的真实。

奎多：确实如此，但是我觉得观众会感觉得出来。比如跑步的时候，虽然只记录了一小段，但是那个到了终点的镜头，观众一定可以感觉到你是不是真的跑完了全程。拍游泳的镜头时我跟摄影还起了争执，他认为镜头有瑕疵要我重游一次，我坚决不肯，只有第一遍是更接近真实的。

《芭莎艺术》：为什么影像中会选择肖邦和亚历山大帝的故事？你对这种无法“归家”的人特别有兴趣？

奎多：可以这么说，也是我在处理我和我的“家”之间的关系。肖邦出生在波兰，19 岁的时候离家去了法国巴黎，在那里生活了 19 年，后来因为战争爆发没办法回到家乡最终客死他乡葬在巴黎。他私下嘱托姐姐把自己的心脏带回波

兰埋在华沙。后来我觉得应该做一个“从华沙到巴黎”的铁人三项。

《芭莎艺术》：你自己应该对“家”有一个特别的定义？

奎多：我没有，应该说这个定义恰恰是我缺乏的东西，过去 10 年我常觉得自己有点“无家可归”，因为我对我出生和成长的地方没有什么积极的情绪，那是荷兰的郊区，很小，生活很平静，不会发生任何故事。那个地方很丑、很无聊，每个人都一样。

《芭莎艺术》：很少有人用“丑”“无聊”这样的词形容自己的家乡。

奎多：真的吗？我觉得在欧洲或者我家乡很多小孩跟我有一样的感受。这世上大概没什么人真的是想做一个郊区小孩吧？郊区是那种很美的你可以跟你的朋友一起在街上打闹的地方，但这种环境不太能激发人的灵感。



Guido van der Werve

Nummer veertien, home

MARCH 20, 2015 — JUNE 20, 2015



M WOODS美术馆奎多影像展海报，展览由佳士得拍卖行、北京W酒店支持

《芭莎艺术》：影像中有一章关于你的家乡，字幕是 1988，为什么选择这一年？

奎多：1988 年的时候我自己做了个炸弹带去学校，还炸伤了我的眼眶骨，算是我童年记忆中印象比较深的故事。

《芭莎艺术》：你“无家可归”的感觉让你觉得跟肖邦有某种共通点？

奎多：或许是吧，但我觉得这是我们这代人的

通病，我们在世界各地游走，与来自不同地方的人交往，有种挥之不去的飘零感，我们在很多地方都有落脚地，但你很难说有一种归属感。虽然我经常在各个地方居住，但我觉得我正在逐渐失去弹性——原来当我要到新的地方居住时，我会对一切新的事物好奇，但现在已经越来越来越少东西能够让我激动了。

《芭莎艺术》：哪里是你真正意义上的“家”？

奎多：很难说。

《芭莎艺术》：“疼痛”是你影像中一条暗线？因为最后一幕的题目叫作“我不再觉得疼痛”。

奎多：可以这么说。因为肖邦是个一辈子都病痛缠身的人，几乎染上了所有的疾病。在他临死的时候，别人问他什么感觉，他用法语回答说“我不再觉得疼痛”。我觉得很浪漫，那一幕我让一个法国的唱诗班用英文唱“我不再觉得疼痛”。

《芭莎艺术》：有没有一个藏在你所有影像作品中的暗线？

奎多：我认为它们都是很敏感多情的，里面有我自己的影子，或者说，它们都在探讨生命的某一阶段，这些敏感多情的东西往往在午夜击中我。我希望它们能以一种开放的态度，让每一个观众都觉得这部电影是关于自己的。

《芭莎艺术》：你曾经在其他的采访中说过你不是一个导演？

奎多：我很喜欢电影，但实际上我从来没想到做一个导演，我更多地把它看作一种很丰富的艺术表达方式——有了声音和画面，艺术多出了很多可能，我并不想在电影这种媒介形式上取得什么成绩。

《芭莎艺术》：最喜欢的导演是谁？

奎多：我很喜欢瑞典导演罗伊·安德森（Roy Andersson）的《二楼传来的歌声》（Songs from the Second Floor）。他刚出了新片，但跟之前的片子很像。很多电影导演都在进行重复的创作，这让我觉得很厌烦。除此之外我还喜欢拉斯·冯·提尔（Lars Von Trier）和大卫·林奇（David Lynch），他们的作品比起电影应该说更像影像。